

多元的對立還是多元的溝通？

劉青山

本世紀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學術之日益多元，是一個不可阻擋更無法逆轉的大趨勢，也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有利條件。《二十一世紀》今後自當充分發揮它多元溝通的功能。

在《二十一世紀》創刊五周年之際，翻看創刊號「編後語」最後兩句話，不禁感慨萬端：「在這個知識和社會都在急劇變化的時代，不同專業、不同地區的知識份子，特別需要的就是溝通。我們盼望這份刊物能成為供海內外知識份子自由交流溝通的一塊新園地。」如果說，這些話在當時不過是編者的一種期待、一種慎戒，那麼在今天則可以說，它恰恰是五年多編輯工作中最深切的體驗：許多焦慮由之而起，小小慰藉也由之而得。

五年來，在本刊近十個欄目一共刊出了大約600篇文章，作者主要是散佈於大陸和世界各地的華人學者，也包括一些著名西方及日本學者，他們在本刊發表了不少有原創性、啟發性的文章。從本刊最近五年所反映的中國學術文化的一般趨向，我認為或許可以稱之為多元化格局的出現，這一點特別表現於在本刊發表之後引起激烈爭議的那些學術文化討論。

例如，從91年持續到92年的關於如何闡釋「克己復禮」的爭論，顯示出不同專業（哲學與史學）之間在基本觀念上可以有多大的分歧。92年的「中國近代思想的激進與保守」的論辯，更可以看出不同地區的以及不同時期（如89年前後）的顯著思想差異。93年本刊率先用中文討論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石激起千層浪，至今餘波未了。而從94年起的一系列學術文化討論，如「中國『國家能力』的辯論」、「當代藝術：創新抑或撞騙？」、「經濟民主·政治民主與中國」，以至今年2月開始的「評九十年代中國的文學批評」，則是由在海外工作的大陸背景學者和文化工作者發起，然後引起大陸學術文化界的熱烈回應，欲罷不能。不同的、甚或是對立的觀點和立場在本刊交鋒。

這種多元局面的出現一方面令我深受鼓舞，另一方面我也無法不感受到日趨明顯的多元對立，以及不同觀點和處境的人與人之間相互溝通的困難。特別是在私人通信、通電話和見面交談時，更能聽到尖銳坦率的心聲：「某某的文章，簡直是在製造西方對中國的誤解。」「某某同中國完全隔膜，本來意識形態強硬派已理盡辭窮了，又來為他們注射西方時髦理論包裝的強心劑。」「《二十一世紀》是否忌諱發我們的文章，怕被人認為有某種傾向？」「某某的文章炸了鍋，

在北京不會有任何一個刊物能發表！」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更有位朋友一見面就問：「《二十一世紀》有沒有自己的立場？」

我認為，中國文化逐步走向多元化，多元之間的相互碰撞就會隨之加劇，而這也是中國文化發展不可避免的階段。二十世紀以前，無論說中國文化包容了多麼豐富多樣的文化和思想，無論說其曾受到外來文明（例如佛教、西方文化）多麼廣泛深入的衝擊並作出積極回應，但就作為群體生活經驗的文化規範而言，中國文化畢竟還只是指大陸中國人的文化。這種情況在本世紀中葉開始改變。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三個地區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各自發展，形成相關而又各具特色的中國文化及學術研究。今後中國的文化建設，肯定不能脫離兩岸三地之間的互動和溝通的影響，這已是人們的共識。而近十幾年來中國大陸的重新開放和經濟快速增長，打破了幾十年來的政治一元化社會生活，文化生活因而也隨之日益多元化。雖然至今意識形態控制還未放鬆，但大陸上已出現不同的學術研究方向和派別，例如北京與上海就有明顯不同取向的文化評論。過去，大陸知識份子經常被視為背景和知識結構相同的整體，但今天這個前提已不復存在了。隨着數以萬計大陸留學生赴海外進修、就業，或回國進入教研和文化機構，海外和大陸學術文化研究的面貌與生態也開始產生變動了。由此亦可見，在本世紀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學術之日益多元，是一個雖然緩慢，但不可阻擋更無法逆轉的大趨勢。

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這種中國文化的多元化及緊張、碰撞，在不少人心中產生了極大的困惑乃至焦慮。但我認為，文化創造的動力恰恰來自於多元的溝通，因此，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多元化，正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有利條件。這也正是本刊在五年前創刊的宗旨。和五年前不同的是，致力於文化建設工作的中文刊物已經在過去兩、三年間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了。作為這眾多刊物的一員，又處於香港這樣開放和自由的地區，《二十一世紀》今後自當盡更大努力，來充分發揮它多元溝通的功能，以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來臨。

劉青峰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編輯



在我們的編輯工作室。左起前排：林立偉、張素芬、何潔鈴、李潔兒，
後排：關小春、余國良、金觀濤、劉青峰、邱玉明、黎群嬌。